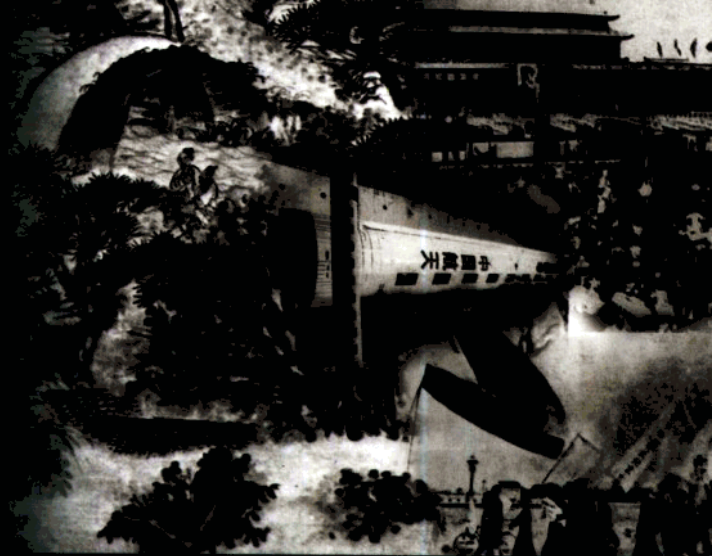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论丛



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



文化, 传统
中国
社会主义

前 言

这套丛书设计的初衷是满足两个目的：一是作为一套专著，反映本学科同仁多年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求为理论事业的繁荣尽绵薄之力；二是作为一套研究生教材，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相对规范的教学用书。

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发现要同时体现这两个目的存在着一定困难。专著所要求的理论原创性与教材所要求的学科基本知识的包容性不易兼得。为了具有可操作性，我们遂强调以体现教材特点为主、兼顾学术特色的指导思想。尽管如此，由于各位作者在理解方面的差异，实际形成的书稿仍然存在着在两种规范之间摇摆的情况。

带来上述窘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历来是各个学科点自主确定的；即便是同一学科，在课程设置及讲授内容上往往也是见仁见智。像我们这样冒冒失失地打出出版“教材”的旗号，似乎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就无法借鉴兄弟院校得到公认的教材范本的经验。然而，我们思考一再，还是不愿意藏拙，决定把这件事做下去。这有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对象客观上面临着变化，为学科发展计，亟需横向的学术交流。我们愿意通过这套教材，表达关于教学内容改革的基本想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学科是改革之初出现的。

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三足鼎立，共同承担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任务。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本内容的话，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以它们为基础所派生出来的政治结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宏观证明或者说逻辑理论，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微观证明或者说策略理论。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确定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之后，原有的以强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不能有效地体现现实政治的要求。这种局面迫使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做出调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兄弟院校大体选择了三种发展模式：一是全面转向邓小平理论；二是演变为国际政治；三是改换成行政管理。这些选择都包含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没能完整表达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的含义。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改革，主要应该选择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方向。这一方向包含两个环节，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逻辑理论，即经济学哲学证明；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策略理论，即政治学证明。这是因为经典社会主义只论证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必然性问题，没有论证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经典社会主义只提出运用计划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提出运用市场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说，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当年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立场上去。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被肢解开来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板块，有的只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

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思考。

其次，我们学科点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已有20个年头。以前虽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有的成果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教材体系。这套丛书将基本满足教学需要。

当然,研究生教学是把学习与研究结合在一起教育行为;与本科阶段的学习相比,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更加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它除了依托学校的图书资料、师资队伍、学术氛围之外,还依靠既定的课程体系、阅读书目、社会实践等,共同形成本专业所要求的教育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教学用书,既要求表现学科的基础知识,又必须反映学术界及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何做到兼有兼得,并非易事。

除此以外,由于这套丛书与作者个人的研究对象和角度相关,我们除了对丛书的宗旨做出要求之外,还在文字总量和体例方面做出规定,并不强求观点一致,更无法体现写作风格的统一。因此,每一本书反映的都是作者自身的学术水平。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学术界同行及读者诸君能为自己的成果乃至丛书本身提出批评。

余金成

2000年5月1日

目 录

前 言	余金成 (1)
导 论	(1)
第一章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0)
一、农业的文化	(10)
二、宗法的文化	(21)
三、封闭的文化	(34)
四、专制的文化	(40)
第二章 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思想	(45)
一、社会主义——“一源”还是“多源”	(45)
二、“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概念辨析	(48)
三、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概览	(50)
四、中国古典社会主义的逻辑终结	(78)
第三章 传统文化与毛泽东	(80)
一、农家子弟毛泽东	(81)
二、思想者毛泽东	(89)
三、共产旗手毛泽东	(99)
四、小结	(108)
第四章 传统文化与邓小平	(110)
一、邓小平与毛泽东	(110)
二、邓小平与传统哲学	(113)
三、邓小平与传统伦理观	(118)
四、邓小平与传统教育理论	(124)
五、小结与说明	(128)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	(130)
一、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和基本特征	(132)
二、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	(137)
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反思	(143)
四、小结	(151)
第六章 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153)
一、均平思想	(153)
二、重义轻利	(158)
三、重农抑商、重本抑末	(162)
四、“小国寡民”，我族中心	(166)
五、小结	(170)
结语	(172)
主要参考书目	(176)

导 论

要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和透彻了解中国国情,否则就会陷入主观盲动、教条僵化、忽“左”忽右的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完善以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决策的出台,无不表明了我们党在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方面的进步和成熟。

当前,在应该认清国情这一点上,已经无人持有异议。但是,在如何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国情方面,我们并非已无事可做。我们注意到,有一部分人还只是把国情看作客观物质条件,而没有看到国情也为人们用来认识国情的指导思想注入了不可排异的成分。也就是说,国情既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有意识层面的内容;而后者既是认识的客体,又是参与认识的主体,因而是更为复杂、更难以把握的。

谈到意识层面的国情,一个不可以忽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中国更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经百年曲折推导的结论。

中国和社会主义何以能够互相选择?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无疑是其根本的客观背景。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神髓相通的观念形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此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感谢传统文化。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破开了中华帝

国亘久的坚壳。随之，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中西方文化两大板块发生了大面积的碰撞。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于我们整个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那就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追逐利润的商品经济观念，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重农抑商观念的强烈抵触；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大同思想为主干的中国古典社会主义^①思想擦出了火花。这一火花对于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意义能否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相比，我们在更为充分的论证之前，还无法得出结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一火花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动信号。

到目前为止，在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观点：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科学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只是一个“舶来品”，是在近代才传入中国并对思想界发生影响的。笔者认为，事实确否如此，还很有探讨的余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它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都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疑也是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我们既然承认这一点，就应该同时承认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和重复性。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具备，在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在彼时彼地也同样可以发生。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反映被剥削、受压迫阶级要求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完全平等，进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思想，不可能只在西方的剥削制度下产生，而不在中国的剥削制度下产生。列宁说过，“靠牺牲别人来经营”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

中国的剥削阶级制度曾延续了数千年。面对着人世间的种种

^① “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是笔者对自古代至近代发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称谓。此称谓是否准确，愿聆听指教。因本章主题不在于此，故不详论。

不平，无数志士仁人提出过许多改造社会的方案。而其中的大同思想既历时悠久又连绵不断；既入先贤典籍，又广播民间大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境界的描述，到老子“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小国寡民”的超然物外的理想；从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战斗口号，到康有为“去国界，合大地”的主张，我们听到的，难道不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式的呼唤吗？

就连外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曾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亚洲只有一个，喜马拉雅山只是为了使两个伟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共产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具有《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分享荣耀而存在的。”^①

前苏联历史学家齐赫文斯基曾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比较，他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超过了圣西门的主张，而与傅立叶的社会理想共同之处最多，这使他和著名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成为一流人物。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外来社会主义思潮融汇的因素不光有它的社会理想，它的某些价值观念也是同社会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轴心是集体主义，它主张破私立公，主张从全社会的进步、公正、和谐中追求和获得个人利益，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儒学的“仁”即是指个人的价值自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一类的主张，就很有些集体主义的味道，即使作为今日社会主义社会的行为规范，都不会显得落伍，更不会是一种异己的因素。儒学中的“礼”，强调的实际上是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和融洽，是“仁”在社会关系中的外在表现。这同社会主义社会主张的团结协作、有组织有纪律是毫不矛盾的。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旷达和

^① 见汤因比著、山口光翻译《现代宗教的课题》，日本 YMCA 同盟出版部 1960 年版，第 1、2 页。

高远，同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深刻与博大，如果不能相提并论，也至少可以异曲同工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也很容易被具有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宗教狂热。世界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 在中国诞生的。佛教在中国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国外的地位。而儒教（如果称之为“教”的话）则具有较浓的人世色彩。至于道家“不逆自然，顺其自然而生”的主张，则更是历代中国人在同数不清的天灾人祸作斗争中恪守不移的信条。毛泽东不拘泥于马列书本，不照搬“老大哥”方案，不屈从洋教头指点，创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之路，为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极好的注脚。

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和贯彻的群众路线，能够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虽然阶级属性不同、但价值偏好却又相似的思想渊源。前者似已无需赘述，后者亦不乏其例：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信民众而成天子，信天子而成诸侯”。唐代柳宗元、清初黄宗羲都有过“公仆”论，即认为君主和官吏应该是自觉地超脱自身的个人利益而为公众服务的人。

由上述例证应该能够认定，如果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没有一个萦回千年的乌托邦之梦，那么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就很难打动和感悟他们。因为，历史一再地证明了，华夏民族是一个在精神文化上出奇地执拗的民族。一个又一个强敌在肉体上征服了它，却无一例外地、身不由己地在文化上被它所征服。

然而，“执拗”带给执拗者的并不都是、也并不总是恩惠。它就像一个桀骜不驯的顽童，时而逗乐你，时而惹哭你；时而给你欣喜和亢奋，时而又给你感伤和迷惘。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即是类似的一种情景。

是传统文化协助社会主义在中国生发成长，也同样是传统文化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曲折坎坷而又阻碍重重。中国现实社会主义比之经典的社会主义或理想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还存在许多缺陷,正是这些缺陷把社会主义改革推上了日程,它们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阻力。而当我们把对现实世界的审视同对历史轨迹的观照对接之后便会发现,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能够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根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不仅有助长社会主义的成分,也有障碍、干扰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不能时时地用冷静清醒的头脑检讨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就既无法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也无法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华。

谈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最重大的和最本源的,莫过于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扭曲作用或者“修正”作用了(不知可否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常常存有一种困惑——他们一再地对身边的现实同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之间的反差百思不得其解:在我们这个言必称马列、行必循“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许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对马克思主义数典忘祖、我行我素?比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重要论述——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制和工人工资制,我们的官员们就很少有兴趣;对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发扬人民民主的杰出思想,我们的“公仆”们也热情不高;相反,搞起特权、家长制、一言堂来,他们却无师自通,兴味十足……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大多还在思想根源上。也就是说,那些给老百姓制造了困惑的主角们,不是接受了已被“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自己去“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由这样的人去“教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不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仰危机”才是怪事。

我们检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须注意五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中国并非是一片可以任意耕种的文化处女地。如众所知,中国当时已经具备了十分厚重、十分系统的文化积淀。而且,产生了这种文化的客观背景和历史过程,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背景和历史过程大相径庭。大体说

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是海洋的、外倾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大陆的、内倾的、农业的、宗法的、封建主义的文化。由于这样的特点,中国人虽然在一定的人口中和一定的层面上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但较难在全社会范围普及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用说在建国前,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已被确立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环境下,真正自觉地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而又真正自愿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到底有多少,也是一个不说惶惑、说来尴尬的话题。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是水与乳的关系,而很像是水与油的关系——它们能够相容,但是不能相融。事实上,它今天在很多人的头脑里也是“水”“油”共处的:表层、外观的是“油”,深层、内涵的却是“水”。

第二,中国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批开创者,在接触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先期接受了全方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书本的、学堂的和生活的、民间的)。他们是以中国文化之“眼”去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书的。这肯定会给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诠释和实践打上深深的传统文化的印记。一代伟人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和挥洒打赢了一场改变中国乃至一部分世界的面貌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革命战争。他的文韬武略,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但是,论现代化建设以及民主和法制,他却“稍逊风骚”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外行”到常识水平之下。在他身上,“中学”与“西学”的严重不平衡,让人们在敬佩与赞叹中夹有一丝惋惜。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这个引导中国人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总设计师”,好像是历史故意安排来收拾毛泽东身后局面并同毛泽东前后辉映的。他以自己的智慧,逐一地打理起毛泽东的那些“外行活计”,并使它们迅速繁盛起来。这同邓小平16岁就留法勤工俭学,从而形成了比毛泽东“偏西”的知识结构,不能说没有关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的胜利，是通过一场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斗争实现的。农民是一个如果不能奴役别人就甘受别人奴役的阶级，是一个时而绵羊般地承受既有精神武器的统治，时而又猛兽般地把一切文化砸烂的阶级。农民以及农民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土壤和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封建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媒。固然，我们不应该搞“唯成分论”，不能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如果农民在革命主体中所占比例大过了一定的界限，那么，农民所具有的一切阶级特质，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这场革命以及革命以后的各项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被掺进了封建主义和小生产的杂质。这种杂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干扰不仅表现在理论层面，而且往往更多地表现在实践层面。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我们的书本里和在经典作家的书本里所表述的并无出入。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就曾经把整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个人的专权。再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成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主人，全社会的劳动者形成了互助合作的关系；可是在实际中，我们的普通工人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却很少有发言权；社会的各行业之间也是互助与“刁难”同时存在。又如，凸现着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法律、规则、章程的体系，几乎时时处处受到中国人骨子里农民式的“自顾自”和人情风的啮啃。在蔑视、破坏或肢解法律和秩序中寻求方便、获得快感，可算是先人遗传给我们的第三种“大欲”了。

第四，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一场“倒置”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尚未形成之时，首先开展上层建筑（准确说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用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过程，会给新的社会留下一项艰巨的“后续工程”，即社会意

识(属思想上层建筑)的革命性改造。因为,旧的政权可以在短时间内用暴力打碎,而旧的思想观念是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被打碎的,它必然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新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影响。就此,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是由扛着旧脑袋的“旧人”来建设的。今天看来,我们的“后续工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社会上乃至执政党的内部,“旧人”还随处可见。

第五,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同封建社会有许多“形似”之处。具体而言,基本上按照斯大林模式建构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客观形式上同我国封建制度在不少方面都很接近。例如: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央—郡县的行政框架,上级任命、终身任职的官员选拔机制,森严的等级制度及其附着的特权,大一统的言论管制,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官本位的价值取向,等等。应该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同封建制度的“形似”,是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被封建主义“借尸还魂”的。诚然,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会自然而然地、一劳永逸地保有它的革命性本质,被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或社会势力以武的或文的方式复辟、演变的危险性随时存在。几十年来,我们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一直睁大着警惕的眼睛。可是,对封建主义“和平演变”却视若无睹(至今,我们连“封建主义和平演变”或类似提法都没有见过。可见人们对此的麻木)。建国后,我们搞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几乎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搞过一次针对封建主义的运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前进的每一个阶段上和从军事到政治、到经济、到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上,先祖遗传给我们的传统文化,总是同我们从西方学来的、并主动积极地将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共同起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无形的、不自觉的,后者是有形的、自觉的。换句话说,应该由哪种思想指导我

们，与实际是哪种思想指导了我们，还不能划等号。较长时间以来，许多人把旧观念和由旧观念导致的实践偏差，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至丧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和追求。

同时，在急待重塑民魂、再树信仰、增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的现时期，也有一些人扎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里寻找济世良方，甚至大唱“前朝曲”，主张以“新儒学”或其他的什么“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次新的正本清源的工作：分清哪些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哪些是已被旧传统扭曲了的、貌似马克思主义的落后观念；哪些是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哪些是阻碍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

“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摆脱了几十年“左”的思想束缚。可是，我们的许多人，至今还“自觉自愿”地受着延续数千年的旧文化、旧传统的束缚，这是一个以笑脸演出的悲剧。敲响这一悲剧终场锣鼓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头。

第一章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分析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自然要首先对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然而，观察问题的目的和角度不同，结论也就有可能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本文要作的分析，一不是纯文化学或美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就文化谈文化，而是从现实社会主义的既有状态出发，去追索、反观它的文化根源；二不是面面俱到的和完整系统的，而是有选择有侧重地观照那些对现实社会主义发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消极影响的方面。

一、农业的文化

上苍似乎格外地偏爱中国，为中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使中国人不必另费心思去找寻农业以外的活路。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这个空间领域广大，腹地深远，能够开垦出充裕的耕地。从西汉至清康熙时，中国人口几经增减，一直没有超过 6000 万，人地矛盾远非今日这样尖锐。

中国大部地域属温带气候区，其次属亚热带，只有很少的面积是热带和亚寒带，能够提供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良好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等条件，人类需要的大多数重要农产品都适宜在这里生长；这里还有源远流长、流域广阔、水系庞大的大江大河。仅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就覆盖了 19 省市 250 余万平方公里土地。为华夏先民提供了灌溉之利，渔舟之便等等。

应当说，中国农业经济的先天条件是如此充分，以至于中国人

“想不出”除种田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谋生手段(话说回来,由于中国地形地貌的封闭性特征,中国人也不容易“想出”其他谋生手段,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详述)。

正因为这样,在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一直是引领风骚的先进国家,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世代中国人则深深地沉醉于男耕女织、小桥流水的田园美梦之中,延续数千年不愿醒来。在其他民族已经大步跨入工业经济时代后,仍然步履蹒跚地徘徊在阡陌纵横的田间小径之上。

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人们在这两种经济形态中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价值体系也完全不同。

农业经济通常被学界称为“匮乏经济”。

农业经济的命脉是土地,而土地这种生产手段与其他生产手段的最大不同是,它的面积是有限的,无论技术水平如何先进,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拓展土地面积,而且,这本已有限的土地的经济报酬又是递减的而不是递增的,地只会越种越“瘦”而不会越种越“肥”。一个“有限”加上一个“递减”,就限制了中国的资源的供给,或者说,限制了中国财富的增长。

但是,农业经济在限制财富增长的同时,却会“鼓励”另一种产品——人口——的增长。因为,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很大,又有很强的季候性,必须按照最忙时节的需要储备足够的劳力,这就刺激了人口的膨胀。而与土地面积的有限性相反,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理论上讲——却是无限的。实际上,农民们在生产人口之前,并没有经过计算,看看自家的田里到底需要多少劳力。况且,他们生育的动机并不只是增添干活的人手(如延续香火,扩大家族势力的宗法观念也是人口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为后话)。这样,在农业经济中,人口的增长往往会超出哪怕是最忙季候的实际需求,而呈现出无序的、盲目的状态,陷入“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这一循环还会难以避免地带出另一个循环——“越垦越荒,越荒越垦”。因为,当一定的土地供养不了一再增长的人口的时候,人